

# 中国转型期的农户兼业问题研究综述

周晔馨<sup>1</sup>, 伍琴<sup>2</sup>

(1. 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1; 2. 四川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成都 610068)

**摘要:**农户兼业是中国转型期的重要经济现象,但是目前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本文回顾并总结了对兼业进行的多角度研究,包括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农业生产和劳动分工同农户兼业的关系,以及兼业的调查数据分析和国际比较研究,分析了各种研究的贡献及其局限。通过评述与农户兼业相关的文献,对转型期农户兼业的研究思路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几条路线。

**关键词:**农户兼业;劳动力流动;土地流转;户籍制度;劳动分工

**中图分类号:**F32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9)04-0022-08

Justin Yifu Lin 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仅是一次性的突发效应,到1984年全国范围内都实行联产承包以后,这种制度变迁的冲击已经释放完毕。此后,农业发展放缓,农户有再度被集体化的危险<sup>[1]</sup>。但随着农业的发展和农村市场化政策的逐步实行,使得农村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劳动力加速从种植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的农户由此开始走上兼业式的发展道路。Garry S. Becker 认为现代经济学忽视了家庭经济行为,主张以家庭为单位,将家庭中的生产、消费和劳动力供给等决策有机结合起来<sup>[2]</sup>。而我们知道,农户兼业是以家庭为核算单位,在家庭土地、社会保险、户籍、地理位置以及家庭人力资本结构的既定约束下,寻求家庭收入最大化的过程。可见,把农户作为一个经济体进行分析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兼业过程作为农户在既定约束下理性选择的结果,促进了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促进了社会的分工和分化。而兼业过程与城市化进程的不一致,不仅使得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等要素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最优配置,阻碍了社会对专业化经济和分工经

济的利用,而且不利于缩小基尼系数。因此,从兼业角度来研究我国的二元经济转型,具有独特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把农户从事非传统农业经营活动统称为农户兼业。农户兼业化是在一定时期内农村累计兼业人口占初始总人口的比重扩大的趋势,或单个农户的非农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增大的趋势<sup>①</sup>。前者从农户整体的角度来看,后者是从个别农户的角度来看。兼业不包括狭义农业内的职业多样化,而是指传统农业和非传统农业(包括广义的农业)之间的职业多样化。第一种兼业农户(简称“Ⅰ兼户”),指以从事农业为主,兼做非农经营(包括外出打工),家庭收入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第二种兼业农户(简称“Ⅱ兼户”),指以从事非农为主,兼事农业经营,家庭收入以非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纯农户又叫专业农户,指仅仅从事农业的农户。本文涉及的文献对兼业的界定各有不同,但和上述界定基本一致。

本文回顾和梳理了对农户兼业与户籍制度、劳动力流动、土地制度之间关系进行的研究,兼业对农业产出影响、有关调查研究和国际比较研究,以及联

收稿日期:2009-02-13

作者简介:周晔馨(1974—),男,四川都江堰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领域:三农问题、社会资本、劳动分工;

伍琴(1972—),女,四川仁寿人,四川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领域:教育经济学,三农问题。

系兼业和分工的文献。在评述这些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几条路线,希望引起学术界对兼业现象的广泛重视,并力求为深入进行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提供有益的思考和线索。

### 一 现有户籍制度下劳动力兼业式流动

贺振华和李实明确地把农户作为一个经济主体,对兼业与就业选择以及兼业流动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研究。贺振华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建立了一个分析框架,分析农户兼业的条件及各种因素对兼业的影响,并从理论上分析了兼业的形成机制以及兼业的后果,提出工业工资、农业收入、农业生产最低投入时间、农户劳动力结构以及农户外出可能从事的工作影响了农户的就业选择<sup>[3]</sup>。因此,该文献将兼业与农户的就业选择(劳动力流动)联系在一起,认为兼业的发展是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一个必经的过程,在现阶段,兼业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也有利于以后农村劳动力的彻底迁移。李实利用有关抽样调查数据,通过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分配效应的实证分析,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但可以直接、间接地提高外出打工户的家庭收入水平,而且就全国而言还会抑制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发挥积极的作用<sup>[4]</sup>。

除了李实和贺振华等人,国内学者大多数都没有把农户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这和我国农户兼业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劳动力流动或转移,或者说交织在一起的特点有关。解释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包括 Lewis 的二元经济理论<sup>[5]</sup>,Fei-Ranis 模型<sup>[6-7]</sup>,以及 Todaro 模型<sup>[8]</sup>,国内学者利用这些模型对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做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研究虽然一般都没有直接提及兼业,却是在不同的侧面研究兼业,因此可以归为兼业的一部分文献并成为深入研究农户兼业的部分基础。

比如,李强使用问卷资料分析了在中国户籍制度背景下产生的特殊的推拉模型(Push and Pull Model),发现中国的推拉模式与国际上相比存在着巨大差异,户籍是影响中国城乡流动的最为突出的制度障碍,它不仅对推拉发生一般的影响,而且还使得推拉失去效力。该文运用生活目标、生活预期、心理定位和生命周期等概念来分析这个过程<sup>[9]</sup>。陶然和徐志刚认为户籍、劳动力流动和土地制度三方面具有紧密关联,需要整体分析。该文提出通过给予

农民在土地和城镇社会保障之间的自由选择权从而建立起一种良性的城市化机制,从而实现户籍制度和农地制度改革的突破<sup>[10]</sup>。这对于从政策上促进农户兼业转化具有很强的参考意义。而韩长赋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兼业”提法,但事实上就是在兼业的特点下研究劳动力流动,他认为农民工亦工亦农、亦城亦乡、流动就业并逐步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的兼业现象将长期存在,并构建了农民工城乡流动和人口城市沉淀模型,描绘了农民工的人口城市沉淀曲线,指出解决农民工问题要持城乡统筹方略,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要以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为动力,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要以人为本,公平对待,构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社会支持体系<sup>[11]</sup>。该文的特点是结合了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来研究兼业,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导向。

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和农户兼业的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二者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不能混为一谈。因为农户兼业是基于农户家庭整体的研究,而一般劳动力流动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宏观数据,而且往往考虑的是兼业中的流出劳动力,而不是把家庭作为分析的单位。另外,它们隐含的一个假设是分工模式已经既定(而我国改革以来的发展恰恰伴随着大规模的分工变迁),因此就集中于考虑劳动力流动问题。总之,一方面,那些概括工业化、城市化和劳动力转移的经典模型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特点的劳动力转移来说,兼业是突出的特点,而国内的劳动力流动研究大多并没有体现出兼业的特点。我国的兼业问题难以使用经典模型来解释,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新的,但是更接近现实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研究。

### 二 兼业与土地制度之间的关系

部分学者认识到,形成兼业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土地制度和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制约兼业户向非农化发展的原因也在于此。

姚洋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次上探讨了非农就业结构和土地租赁市场发育之间的关系,指出农村土地租赁市场不活跃与劳动力市场的限制性相联系,因此,要形成一个活跃、有效的土地租赁市场,其他要素市场的改革与土地制度改革一样重要<sup>[12]</sup>。李菁、姚洋分析了土地分配制度与农村劳动力外出行为之间的关系。他们通过理论模型说明土地对农村劳动力的外出打工可以起到保险的功能,并通过经

验分析发现农村中人均土地占有量处于中间水平农户的外出打工倾向最为强烈,外出打工倾向与土地占有量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sup>[13]</sup>。

贺振华在成本收益分析的框架下,从土地供给的角度分析了土地流转市场发展缓慢和地区不平衡的原因。该文假定农户可将时间投入到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中,土地的供给是农户在兼业和外出之间权衡的结果。对于主要劳动力不足的农户而言,兼业充分利用了家庭的次要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但是,兼业又使得农户主要劳动力正常的人力资本积累中断,这导致其在其他时间上的收入降低<sup>[14]</sup>。

肖文韬分析了在农地市场封闭性、资产专用性及社会保障状况的约束下,农户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是兼业经营。兼业经营的必然结果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更大范围内农户的兼业经营。增加农地市场的开放性、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可以促进农地流转,从而有效避免因不当的兼业经营导致的效率损失<sup>[15]</sup>。而胡浩、王图展通过计量分析认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规避兼业效应主要是要解决农户兼业带来的土地流转滞缓问题<sup>[16]</sup>。另外如前文所述,陶然、徐志刚还将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劳动力流动结合起来进行了研究。

这些文献都认为农户土地规模及土地的保险作用是形成兼业的主要原因,而推进土地的流转可以促进专业农户的增加和非农化,促进效率的改进。总的来说,这方面的文献数量较少,且对土地产权、交易费用和农户兼业间关系的分析都还有待深入。

### 三 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和发展的影响

部分学者,如傅晨、毛益勇怀疑农户兼业会对农业生产造成负面影响,高强的调查也得出了负面结论。傅晨、毛益勇认为,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郊区,兼业化已成为影响农业稳定发展的一个严重问题。他们还认为兼业化是不可避免的,但兼业化导致农业的粗放和低效率<sup>[17]</sup>。高强通过对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的调查,发现兼业深化能有效地利用劳动力,促进农业内部产业结构的转化,但对粮食部门负面影响较大<sup>[18]</sup>。

但是,杨学成和赵瑞莹认为,兼业化对农村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影响,总的看是利大于弊<sup>[19]</sup>。梅建明经过调查研究,发现Ⅰ兼农户的存在及其在一定程度上普及对农业生产率都

不会造成明显影响,但Ⅱ兼农户如果过多则对农业生产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sup>[20]</sup>。白南生利用1994年安徽和四川2820家农村调查户的数据估计了农户的农业生产函数。当外出打工户作为虚拟变量引入估计模型时,估计结果显示该变量的系数估计值虽然是负值,但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从数据中没有发现外出打工户的耕地转包和撂荒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sup>[21]</sup>。其实,即使有负面的证据,也不能据此否定不同兼业道路的动态绩效,而从一般均衡的角度来看,也不足以否定兼业的其他效应。

另外,高强和蔡基宏从不同侧面提出,兼业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要结合土地来分析。高强认为,资源分散型农户兼业化分散了土地、劳力、资本等农业资源,从而阻碍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资源集中型农户兼业化,充分利用了土地、劳力、资本等农业资源,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sup>[22]</sup>。前者如日本,后者如美国、原西德等。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采取资源分散型或资源集中型农户兼业化道路对农业增长的效果不同,农户兼业化可能阻碍也可能促进农业生产的效率,这主要取决于兼业化道路的选择。蔡基宏运用农户模型,推导出在一定市场条件下,农地规模、兼业程度都与土地产出率存在一种反向关系,并将两种影响综合考虑,给出了解答农地规模与兼业程度对土地产出率影响问题的一个新的视角。其结论认为,当兼业程度增加时,若农地规模小,同样可以使土地产出率表现为增大<sup>[23]</sup>。

总的来说,这类文献的兴趣集中在兼业对农业投入产出的影响和农地规模的问题上,大多持一种静态的和局部均衡的狭隘农业生产观。如果农户兼业后转化为非农户,则兼业不仅对农户本身而且对农业产出都会带来正的影响,因此不能单纯考虑兼业农户本身的农业生产率。如果农户在保留土地长期承包经营权的条件下将使用权长期出租,这会有利于土地的集中使用,也有利于农业内外分工的深化。因此,从动态和一般均衡的视角来探讨农户兼业,将深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

### 四 有关转型期农户兼业的调查

这方面的早期研究侧重于实地调研,并对农户兼业的状况、动因、制约条件进行归纳描述。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显示,从传统农户向兼业户转变是大势所趋,农户兼业和土地、人力资本、社会保障等问题密切相关,农户兼业化趋势有利于农业专业化发展。

比如,杨学成和赵瑞莹的调研表明,农民兼业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普遍现象,兼业化程度将会不断提高。兼业化对农村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总的来看是利大于弊。兼业的主要动机是增加收入和取得生活的“双重保障”,兼业农民未来“身份”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其主业是否兴旺发达以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否健全<sup>[19]</sup>。高强使用了中国统计年鉴、农业普查及其本人对陕西部分县市的调查资料,研究表明兼业能促进农业内部产业结构的转化,但对粮食部门负面影响较大。同时,兼业深化地区劳动力利用得到优化,这些地区农户收入提高很快,而兼业化不发达地区农户收入来源单调,从而使地区差别扩大,但当兼业进一步深化后反而能促进收入公平化<sup>[18]</sup>。梅建明对湖北省进行的抽样调查表明:当前我国农户总兼业率已经相当高,其中Ⅰ兼农户占主导地位;农户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应是从事非农活动;纯农户的农业生产率水平要略高于Ⅰ兼业农户,Ⅰ兼农户的农业生产率水平显著高于Ⅱ兼农户;由于兼业,耕地不同程度地被闲置;农户劳动力数量越多,劳动力文化程度越高,农户兼业经营的可能性就越大;农户是否采用兼业经营的形式对农业物质投入的影响并不大;大部分纯农户将继续从事纯农业经营,绝大多数的Ⅱ兼农户明确表示,如果条件合适他们将完全放弃农业<sup>[20]</sup>。

不过,近期的研究倾向于更多地使用计量经济模型。这些研究对兼业与宏观经济指标、农民收入的关系,以及决定农户兼业行为尤其是兼业时间的主要因素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计量分析,得到了更为严谨的结论。

如李小建和乔家君根据1986—2002年对河南省农村16个固定观察点1000个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对兼业化程度与宏观社会经济指标、农户经济及差异的相关系数进行了估计,并基于一般农村发展的分析和不同类型兼业农户随经济发展的变化,提出了农户兼业演变4个阶段过程的假设<sup>[24]</sup>。另外,胡荣华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农户人口规模及户均耕地有利于解释各地农业兼业化程度的差异,并利用农普调查资料归纳了南京地区农户兼业行为的主要特征<sup>[25]</sup>。胡浩、王图展对1995—1999年农户结构变化、第一次农业普查各地区农户结构的卡方检验以及对农户的微观分析表明,农户兼业化程度与农民收入存在正相关关系。利用第一次农业普查分省

数据估计的联立方程结果,还发现农户兼业化对农户的农业投资而言兼有兼业效应与收入效应,而且前者之弊大于后者之利<sup>[16]</sup>。陈晓红、汪朝霞利用农调队以及自己的调查数据,应用Logit模型发现,苏州地区农户兼业现象相当普遍,决定农户兼业行为的主要因素包括经营农业用地面积、家庭劳动力结构、当地非农产业发展情况等<sup>[26]</sup>。句芳、高明华、张正河着重从家庭特征、劳动力个人特征、社会环境几个主要方面提出9个假设,并利用实地调研数据,运用Tobit模型判断影响农户兼业时间的主要因素,发现家庭特征解释变量中农户劳动力总数、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农作物每亩农机畜费用总和对农户兼业劳动时间具有显著正影响,农户总耕地面积、农户劳动力人均负担6岁以下孩子人数对农户兼业时间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户劳动力平均年龄与农户兼业时间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sup>[27]</sup>。

## 五 农户兼业行为的国际比较

近年来出现的不少文献考察了美国、日本等国的兼业情况,并和中国的兼业进行了比较,在分析各国兼业利弊的基础上对我国农户兼业的发展政策提出了不少建议。

有的文献着重从劳动力转移和资源配置的角度来比较。如高强认为,二战后,随着农村非农经济的发展,日本农户兼业逐步深化,农户兼业深化进一步促进了农村产业现代化。农户从事非农职业逐渐由临时工向固定工转移,由低层次行业向知识、资本密集型行业转变。随着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异地型兼业”减少,居住于本村的“在宅型兼业”增加。无论美国、还是日本,农户兼业化是农业、农村变革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它将是一个长期现象。资源分散型农户兼业化,分散了土地、劳力、资本等农业资源,阻碍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反之,资源集中型农户兼业化,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前者如日本,后者如美国、原西德等<sup>[28]</sup>。

有的文献着重研究土地使用及土地制度。傅晨、毛益勇分析了日本农业兼业化的经济后果,认为兼业使得农业经营规模细小的格局凝固化,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和女性化,使日本主要农产品的成本远远超过国际市场。1950年的《农地法》为了防止土地再次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严格限制土地所有权的转让、甚至转租经营,使土地的流转几乎成为不可能。日本政府在1970年代开始抛弃把农业改革的

重点放在所有权转移的做法,而转向使用权流转和集中。日本的经验教训对我国的启示在于:我国必须加快制度创新的步伐,以解决土地的集中使用和兼业化导致的农业粗放问题。对待兼业化的正确态度是应使其能被调控为界限,而调控兼业化的手段主要是利益的替代,发展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是成本最小的办法<sup>[17]</sup>。

有的文献进行了较为综合的比较。如祁峰通过比较得出,中日两国农户兼业状况的相同点在于:农业趋向分散化,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弱。日本农户兼业不同于中国的特点在于,日本农户的兼业渠道主要为中小企业,日本的农户兼业最早可追溯到“明治维新”时代,真正发展起来则是在二战期间,二战结束后专业农户大幅增加,同时兼业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体,以及日本的农户兼业处于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户兼业成因的不同之处在于土地制度不同和农业的物质技术装备程度不同<sup>[28]</sup>。祁峰还认为,二战后,农户兼业是日本农业经营的一个重要特征。农户兼业是日本农民综合各种利益得失后的一种必然选择,但造成了日本农业的分散化<sup>[29]</sup>。

还有的文献直接研究了国外的兼业情况,可以为我们对比、借鉴提供参考。如董智明、王建红反对多数文献认为的农户兼业导致了日本农业劳动力结构不合理,影响了日本农业再生产经营基础的观点,提出日本农户兼业化的比例长期居高不下是因为日本农业和经济环境中存在着促使兼业农户不能离农的各种因素,且在这些因素中,经济的衰退和经济增长的迟缓是主要因素。他们利用1963—2000年《日本统计年鉴》和1987年版《日本长期统计年鉴》搜集的数据(其中兼业化的相关数据最早可以查至1926年)进行回归证实了猜想,并提出我国的农户耕作和日本有一定的相似性,必须采取措施推动兼业农户彻底离农,以减少兼业化的负面影响<sup>[30]</sup>。

在进行国际比较中,这些文献都没有深入研究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造成的中国式兼业和国外的兼业到底有什么不同的表现形式、绩效和后果,相反,泛泛而谈的较多。因此,这可能是下一个值得探讨的方向。

## 六 兼业与专业化分工之间的联系

现有的兼业文献基本都强调了农业专业化或非农化是农户兼业的发展方向。如高强认为在农户兼

业化过程中,对土地资源依赖性降低,为土地制度变革创造了可能,通过制定一系列干预政策,就可使大部分农业资源由少数专业农户经营。因此,农户兼业化有利于农业资源相对集中,从而有利于农业专业化的发展<sup>[31]</sup>。梅建明认为日本式资源分散型及美国式资源高度集中型的农户兼业化的发展道路都不适合中国,我国农业发展目标模式应该是实现大量小规模兼业农户与一部分适度规模的专业农户并存发展的经营格局<sup>[32]</sup>。

部分文献直接将分工作为对兼业问题的分析视角或框架。向国成和韩绍凤使用了分工的框架来研究兼业<sup>[33]</sup>,应用了Allyn Young关于分工“四化”<sup>②</sup>的阐述<sup>[34]</sup>,认为在人地矛盾比较尖锐和农村社会保障还很不健全的约束下,农户兼业化必然是农户家庭内分工的长期组织均衡形态,兼业在本质上是家庭成员个体层面的专业化与家庭整体层面的专业多样化的统一,引致了迂回经济的发展,催化了农民组织化的演进,促进了农民个体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和小农经济效率的提高。而周晔馨则在分工—交易效率框架下直接研究了农户兼业,区分并解释了农户家庭内部和家庭间的兼业分工模型,并进一步放宽假设,考虑了具有歧视性转移支付和人口比例限制的兼业分工模型<sup>[35]</sup>。该文采用了分工的视角,联系了交易效率或其交易效率来研究农户兼业,为农户兼业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规范的思路和统一的框架。

还有一些研究农村分工发展的论文,虽然没有直接用“兼业”提法,但却是从分工视角对兼业进行了不同的分析。如X. Yang, J. Wang, and I. Wills从交易费用的角度对商业化和农户兼业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使用中国资料,发现1979—1987年间设定、执行产权效率的改进提高了商业化水平(在农户不放弃农业的历史条件下,等价于兼业化程度提高),反过来又提高了人均真实收入<sup>[36]</sup>。向国成、韩绍凤在扩展了间接定价理论模型,并运用它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组织化的演进路线<sup>③</sup>进行了统一的理论解释。可以说,这对兼业一个侧面——农业组织化进行了深入分析,对兼业的出路进行了解释<sup>[37]</sup>。当然,如果直接联系兼业考察农业产业化和农民团队化,可能会得出更有趣的结论。刘明宇指出,农民贫困的实质是农村经济制度安排抑制了分工演化,使农民在生产 and 交换中处于不利地位,难以

获得分工经济的好处。通过制度变迁,赋予农民以充分的经济自由和土地财产权利是推动农业分工演进、实现产业化的必由之路<sup>[38]</sup>。他虽然没有提及“兼业”二字,但事实上涉及的就是制度对兼业演化的影响。高帆抛弃了传统二元经济理论强调资源配置的分析思路,利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以分工组织演进和分工水平提高为核心概念,提出了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分工演进、加快结构转化的思路,这对于促进兼业分工的发展也是适用的<sup>[39]</sup>。

我们知道,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取决于市场的大小,市场大小又取决于运输条件(其中“运输条件”实际是交易费用思想的初步表达)<sup>[40]</sup>。在新古典框架下,资源配置问题置于研究的核心地位,因而对于与分工相联系的一系列有趣现象的分析就力不从心,这使得其分析方法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sup>[41]</sup>。在Stigler和Houthakker之后分工的研究分为三条路径<sup>[42]</sup>,因此对于分工视角的兼业研究,也可以考虑这三条不同的路径。而第三条路径,即近年来兴起的超边际分析框架,为此类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和有力的分析工具。从上述兼业文献的回顾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农户兼业的许多重要方面涉及专业化和分工演化。那么,运用劳动分工—交易费用的超边际分析框架<sup>①</sup>进行一般均衡分析更接近现实,因为劳动力流动、收入增长、经济结构变化、城乡公平与效率、城市化甚至农地制度变迁等现象都可以从对分工网络的分析中内生<sup>[49]</sup>。

综上所述,农户兼业现象蕴含着丰富的内涵。作为一种历史形成且正在演化中的制度现象,农户兼业本身蕴涵了劳动力流动、收入增长、经济结构变化、城乡公平与效率、城市化以及农地制度变迁等等

当今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不过兼业框架下的研究还需要继续深化下去。除了联系兼业和农业生产,以及对兼业进行国际比较研究之外,另外,未来还可以着重考虑以下方向。

第一,加强经验实证研究。一方面,可以在以往调查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设计新的问卷,进行新的调查以考察兼业是否有新的发展和变化,以及从更广泛的视角来搜集新的数据,如有关非正式制度和兼业的关系,用于证实或证伪相关的理论结论、猜想。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相关年鉴和调查的横截面和面板数据,将农民就业结构、农民收入结构(可以用来代表兼业程度)和收入水平、人力资本、农村金融、交易效率、地区差别等因素联系起来进行计量实证研究。

第二,从劳动和土地要素配置的角度来进行研究。虽然已经有了不少这方面的研究,但是直接和兼业联系起来的还不多,也不够深入。可以沿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但是要修改经典模型的某些假设,尤其是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等约束,并和兼业联系起来,并以家庭为基本单位进行研究。

第三,从分工的视角来进行研究。根据回顾和分析,以下分工问题和农户兼业密切相关:一是农户家庭内部的分工问题;二是农户的专业化,以及与此相关的土地规模经营及专业化经济;三是兼业过程中劳动力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由此带来的产业分工格局变化;四是劳动力兼业性转移对地区分工格局的影响。

第四,联系兼业和城市化关系来进行研究。一方面,兼业和非农化在初期使得城市化加速,另一方面兼业又使城市化继续发展受到阻碍,这种阻碍在何种程度上是动态最优的,以及两者如何互动,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 注释:

①有的文献如李小建和乔家君(2003)将兼业化定义为“农户总数中兼业农户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的趋势”,是不恰当的,这种定义会使得数据分析困难并造成错误,因为II兼户转化为非农户后将不再计入兼业并减少农户总数,从而低估兼业率及其变化。

②即个人专业化、职业多样化、生产迂回化和生产组织化。

③即集体经济→家庭经营→农业商业化→农业产业化→农民团队化。

④又称斯密—科斯框架。

#### 参考文献:

[1]Lin, Justin Yifu. 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2, No. 1,

Mar., 1992.

- [2] Becker, Gary S. Family Economics and Macro Behavior[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8, No. 1. Mar., 1988.
- [3] 贺振华. 农户兼业的一个分析框架[J]. 中国农村观察, 2005, (1).
- [4] 李实.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增长和分配[J]. 中国社会科学, 1999, (2).
- [5] Lewis, W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r[J].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1954.
- [6] Ranis, Gustav; Fei, John C. H.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1, No. 4 (Sep., 1961).
- [7] Fei, J. C. H., Ranis, C. *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Surplus Economy: Theory and Policy* [M]. Richard D. Irwin, Homewood, IL. 1964.
- [8] Harris, John R., Michael P. Todaro. Mi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A Two-Sector Analysi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0, No. 1, 1970.
- [9] 李强. 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03, (1).
- [10] 陶然, 徐志刚. 城市化、农地制度与迁移人口社会保障——一个转轨中发展的大国视角与政策选择[J]. 经济研究, 2005, (12).
- [11] 韩长赋. 中国农民工发展趋势与展望[J]. 经济研究, 2006, (12).
- [12] 姚洋. 非农就业结构与土地租赁市场的发育[J]. 中国农村观察, 1999, (2).
- [13] 李菁, 姚洋. 平均的土地分配与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C]//蔡昉, 白南生. 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14] 贺振华. 农户兼业及其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一个分析框架[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06, (4).
- [15] 肖文韬. 农地流转约束与农户兼业行为[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2005, (6).
- [16] 胡浩, 王图展. 农户兼业化进程及其对农业生产影响的分析——以江苏省北部农村为例[J]. 江海学刊, 2003, (6).
- [17] 傅晨, 毛益勇. 兼业化: 日本农业的困境与启示[J]. 世界农业, 1998, (8).
- [18] 高强. 我国三大地带农户兼业形态研究[J]. 经济地理, 1999, (1).
- [19] 杨学成, 赵瑞莹. 转型时期农民兼业问题的实证研究[J]. 中国农村观察, 1998, (3).
- [20] 梅建明. 工业化进程中的农户兼业经营问题的实证分析——以湖北省为例[J]. 中国农村经济, 2003, (6).
- [21] 白南生. 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对农业影响的实证研究[C]//蔡昉, 白南生. 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22] 高强. 发达国家农户兼业化的经验及启示[J]. 中国农村经济, 1999, (9).
- [23] 蔡基宏. 关于农地规模与兼业程度对土地产出率影响争议的一个解答——基于农户模型的讨论[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5, (3).
- [24] 李小建, 乔家君. 欠发达地区农户的兼业演变及农户经济发展研究——基于河南省 1000 农户的调查分析[J]. 中州学刊, 2003, (5).
- [25] 胡荣华. 农户兼业行为研究——以南京市为例的分析[J]. 南京社会科学, 2000, (7).
- [26] 陈晓红, 汪朝霞. 苏州农户兼业行为的因素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07, (4).
- [27] 句芳, 高明华, 张正河. 我国农户兼业时间影响因素探析——基于河南省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 2008, (1).
- [28] 祁峰. 农户兼业: 中国与日本的比较研究[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3, (6).
- [29] 祁峰. 日本农户兼业化的几个问题[J].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4).
- [30] 董智明, 王建红. 日本的经济增长与农户兼业化[J]. 日本问题研究, 2004, (2).
- [31] 高强. 农户兼业化的本质及其发展途径[J].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 1999, (2).
- [32] 梅建明. 从国内外比较看我国农户兼业化道路的选择[J]. 经济学动态, 2003, (6).
- [33] 向国成, 韩绍凤. 农户兼业化: 基于分工视角的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05, (8).
- [34] Young, Allyn.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28, 152:527-542.
- [35] 周晔馨. 转型时期的农户兼业和非农化——基于斯密—科斯框架的超边际分析[D]. 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

- [36] Yang, X., Wang, J., and Wills, I. Economic Growth, Commerci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s in Rural China, 1979-1987[J]. *China Economic Review*, 1992, 3, 1-37.
- [37] 向国成, 韩绍凤. 分工与农业组织化演进: 基于间接定价理论模型的分析[J]. *经济学季刊*, 2007, (1).
- [38] 刘明宇. 制度、分工演化与经济绩效——基于分工维度对农民贫困的制度分析[D]. 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4.
- [39] 高帆. 交易效率、分工演进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D]. 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4.
- [40] Smith, Adam,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M].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776.
- [41] 杨小凯. 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42] Yang, Xiaokai and Siang Ng, *Specialization and Division of Labor: A Survey, in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Analysis* [M], edited by Ken Arrow et al, London, Micmillan, 1998.

## A Literature Survey of the Issue of Peasant Household Concurrent Occupation During China's Transition Period

ZHOU Ye-xin<sup>1</sup>, WU Qin<sup>2</sup>

(1. Economics Institute,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2.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Peasant household concurrent occupation, an important economic phenomenon during China's transition period, wants going deeper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of which the contributions and limitations a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reflection and summing-up of the researches in various perspectives, including the relation among land system, census-registering system,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labor-division and concurrent occupation, as well as data analysis of the concurrent occupation investigation and comparative study of foreign researches, to probe into the line of think for peasant household concurrent occupation research.

**Key words:** peasant household concurrent occupation; labor mobility; land transaction; census-registering system; labor-division

[责任编辑: 苏雪梅]